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第六版)

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

当代经济学
教学参考书系

[美] 哈尔·R.范里安 著

费方域 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F016
W007

(第六版)

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

[美] 哈尔·R.范里安 著

费方域 等译

当代经济学
教学参考书系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6版/(美)范里安(Varian,H.R.)著;
费方域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陈昕主编)

书名原文: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ISBN 7-208-06085-1

I. 微... II. ①范...②费... III. 微观经济学 IV. F0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8440 号

责任编辑 李 娜

装帧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笑阳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

[美]哈尔·R.范里安 著 费方域 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高等教育图书分公司 出品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4 层 021-63914988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9.75 插页: 5 字数: 799,000

ISBN 7-208-06085-1/F·1367

定价:56.00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则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第六版译者的话

本书第二版中译本自1991年面世以来,被很多高校和社科院长期用作核心教材,深受师生们的欢迎。它的广泛流行,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认真学习现代经济理论的热情和能力;它的成功普及,见证了思想解放后的中国创造增长奇迹的伟大实践。

原著从初版至今,已再版了6次。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第六版的中译本。用作者的话来说,前五版获得了令他感到非常高兴的成功。这些版本在目的、架构、体例等方面一脉相承,保持了主旨上突出标准理论和分析方法(基本概念和定量解答),篇章上强调模块结构和逻辑顺序,论述上力求完整准确和详细易懂的显著特点。不同的只是,后续的版本逐渐地新增了“拍卖”、“博弈论的应用”、“信息技术”等章节,这些章节或者借助传统理论与方法分析新的经济问题,或者概括成功地应用于经济分析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一本普通的中级经济学教材,为什么能拥有如此之多的读者而且长盛不衰呢?一本翻译过来的外国教材,为什么在中国也能如此长久地赢得广大读者呢?一本如此成功的教材,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增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而同时又继续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呢?在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中,为什么有必要大量使用这样一类教材?并且,为什么说这对于我们培养出经世济国的人才,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是条捷径,是个良方呢?这些正是译者想要在第二版“译者的话”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同时也是眼下需要再次加以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一部优秀的中级经济学教科书,应该能

够通过围绕它的训练,帮助读者准确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它为基础来研修高级课程和其他学科,攻读学术文献,或者,也可以凭借它来弄清经济政策和形势,做好实际工作。而要达到这个标准,这部教材就必须既能够深刻理解现代经济学,牢牢把握主流和前沿;又能够明快表述现代经济学,使之合乎逻辑,合乎历史,容易领悟,容易贯通。

本书就是这样的一部优秀教材。首先,它在众多的现代经济学说中,紧紧抓住了新古典经济学这个主流,并将它作为全书的主体详细展开。从逻辑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始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而终于阿罗和德布鲁对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精巧证明。从历史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先通过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分别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方法,对古典的生产成本的价值决定观与边际主义的主观效用价值观进行了划时代意义的综合,又经过萨缪尔森,用最大化和均衡的分析工具,在方法和数学表述上为自己奠定了分析基础。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第一是因为,它能始终扣住并不懈求索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价值决定和资源配置,并不断地推进和更新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它对于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定理的严格证明,分别明确了竞争性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以及在实现帕累托最优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条件,从而既为市场(竞争,价格)在价值决定和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完美和力量提供了理论根据,又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二是因为,是它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寻找和完善可以使它的各个概念、命题、法则得到统一界定和证明的方法论基础。它的理论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公理推出,可以用数学的一般化形式来表述。这标志着它的成熟,也解释了它为何具有主宰和服务其他各经济学分支或应用经济学学科的根本性地位的原因。第三,是因为,它能把自己构造成一个开放、吸纳的体系。认识总是先片面再比较全面的,比如,从主观效用发展到效用是偏好描述方式,从偏好发展到显示偏好。认识总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比如,从确定性发展到不确定性,引出了期望效用、风险态度、确定性等价等概念;从决策发展到对策,引出了一整套博弈理论。认识也总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比如,斯勒茨基方程对吉芬商品等现象的解释,产权与外部效应的关系。因此,一个科学的体系必须要能够扬弃旧知识,接受新知识。越是宽容、能接纳的体系,越有生命力,也越有征服力。独断不是科学态度。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本书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它能在中级水平上,系统而不是破碎、准确而不是含糊、推演而不是武断地将这个理论的全部精华生动地展现出来。当你在书中读到像“边际替代率的含义”这样的章节的时候,你就会深深了解,这种功力的确来自作者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和对理论的透彻理解。

其次,它紧紧抓住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和前沿。上个世纪,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对传统新古典的责难和反思在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第一,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科斯革命。它提出了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问题:为什么有的(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上进行,而有的却在组织(如企业)中进行? 产权、法

律、组织(通过交易成本)对此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是重要的)?当经济活动发生在组织里面时,调节行为和配置资源的机制与市场机制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此前,传统新古典是不讲产权,不讲制度,不讲法律,不讲政治,不讲组织的,科斯革命之后,便逐渐产生了建立在新古典分析基础之上的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等新兴分支学科,它们滋养、丰富和推动着理论经济学主干的拓展和深化。在传统新古典那里,企业只是个黑匣子,只是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企业的性质(为什么要有企业)和企业的边界(与市场的界线如何决定)是什么?企业内部各层级、各单元的激励和协调如何进行?这些基本的企业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研究,甚至都没有被恰当地提出来。而到现在,经济学却有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委托—代理观点的企业理论、交易成本观点的企业理论,和不完全合同与产权观点的企业理论,等等。第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以阿克劳夫、斯蒂格里茨和斯宾塞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它被视为经济学流行范式的根本改变。它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获取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话,传统的竞争均衡模型是否继续有效?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是否还继续有效?在信息(事前或/和事后)不对称情况下,应该怎样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经济学应当如何引入信息问题,是作为自身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将传统理论全部重写?传统新古典是以完全信息为假定前提的,而新范式的倡导者则认为,放松这个假定,竞争均衡就可能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均衡。他们还认为,旧范式不是没有看到信息问题,而是没有办法将它们纳入模型。因此,他们积极地发展起了信息经济学,或叫激励理论,或委托—代理理论,以便处理信息问题;同时,也将它们积极地用于市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政府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之中。第三是以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为标志确立,再经过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夏普利,库恩,塔克,鲁宾斯坦等许多人的杰出工作而迅猛发展起来,并在经济学中取得中心地位的博弈论。它的开创者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通过完全竞争假定(通过假设使价格成为给定),把经济人决策归结为可以规避博弈分析的一个单人简单最大化问题。但实际社会活动几乎都涉及策略互动,所以需要靠博弈论来分析。这个理论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以什么工具)解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冲突与合作)?在相互依赖的策略互动的情况下,人们应该如何选择理性行为:采用什么策略,形成何种联盟?它能否找到一个既相互联系而又根本上统一的方法论?它能否既与市场竞争均衡贯通,又能应用于制度和组织中的激励设计?它发展了一系列博弈均衡的概念和定理,形成了包括完全完美信息(静态与动态的)和不完全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理论、讨价还价理论、合作博弈(合同关系)理论、演进和学习博弈理论、实验博弈理论在内的庞大体系,并被频繁、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本书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它能在同样的中级水平上,通过市场失灵的逻辑联系,巧妙地将信息理论与外部效应摆放在了一起,将应用博弈理论与寡头理论

贯穿到了一起，将拍卖作为市场形式和市场设计与市场供求均衡连接了起来。也许是大想体现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与厂商行为时方法上的一致性，本书没有讨论企业性质，也没有打开企业这个黑匣子。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在他们的《经济学、组织与管理》一书中，对这一问题是这样处理的，比如，他们先介绍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的供求决定模型，然后指出它的不实际，再详细阐述现代激励报酬理论。本书作者其实也完全可以这样对待企业理论，当然对于他作过特别研究并特别熟悉的信息技术那一章，他就是这样做的。

传统与革新，从历史上看是承继的，从逻辑上看是螺旋上升的。这合乎认知规律，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前进着的。从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到牛顿、爱因斯坦和波尔，人类在不断地积累和丰富对于物理世界的认识。在这个领域，人们似乎没有，也好像不需要，因为前人的睿智而让他们的光芒将所有的后人送入阴影，或者因为后人的辉煌而将前人的贡献一笔抹杀。类比于此，经济科学也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思想发展史。不了解新古典，就很难理解现代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所有重大的新成就，都是以它为基准，都要借助于它的一些概念与工具。像新古典经济学这样有着如此深广影响的学说，总包含着人类对经济世界的真知灼识。所以，本书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体，而把合同论、博弈论等留给其他专门的教材来作更多介绍，道理其实就像有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数学和物理学还是将拓扑学和量子力学作为专门课程，而仍然把微积分和普通物理单独作为基础课程一样。在更新的能让这些传统和革新都在自身内部找到恰当位置的体系诞生以前，这种新旧并存的局面恐怕还要持续相当的时间。

有两件轶事值得在这里提一下。一件是关于科斯的，他大学时到企业去，发现那里的情况不像黑板经济学讲的那样，于是才受启发写出了后来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篇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另一件是关于斯蒂格利茨的，他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他是在非洲生活的日子里，才越发感觉到完全竞争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才越发意识到必须按与现实相一致的假定和结论来构筑模型。这两件事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被教授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发生的不一致，而即使是本科的教材，也足以为形成这种冲击提供对照。当然，经济理论也有它相对独立发展的一面。德布鲁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所详细叙述的他为了使一般均衡理论严密化、一般化和简化，而耐心等待、借助和引入数学中新的分析技巧，从而解决了偏好、效用和需求中的几个形式化问题的故事，就是一证。不过，从根本上说，前者总是更重要。数学能使概念更精确，思想更流畅，论证更简明，但只有被直觉验证的数学结论才是更有趣的。而这，也正是本书刻意想做且又做得很精彩的一个方面。

现在来看对本书这样一类教材的中国需求。时下，全世界聚焦中国。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其原因有三：一是继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创造出了持续稳定增长的新纪录；二是继原苏东一些国家转型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更令世人瞩目的业绩；三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自由

化的规模与速度,使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局面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中国的重大问题成了全世界都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中国现在不乏来自全世界的最好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思考中国的问题现在就必须用,也能够用全球的眼光和全人类的知识。总之一句话,解决好了中国的问题,就是解决好了世界关注的问题,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作出了贡献,就是对经济学作出了贡献。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呢?在回答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历史的经验。在中国近代,中国向何处去是时代的中心问题。为此,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学习,他们找来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找来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但是,都失败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情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才在实践中排除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干扰,认清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找到了夺取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的政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过渡时期完成以后,新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实践,所以也就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论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推行的实际上是原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才转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试验计划经济,参与的人这么多,历时这么长,代价这么大,可是到了1976年,我们的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中国试验市场经济转轨,参与的人更多,但历时却短,代价也小,成绩却很大。这两个试验,回答的都是当代中国的中心问题。它们是中国的世界级遗产。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它们。

斯蒂格利茨在他那本被译为《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著作中认为,一些国家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不仅标志着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失败,而且还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式的失败。因为它们之间是包容、支持的关系,它们的根本错误是一样的。他还认为,一些国家的转型不太成功,其实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从而也是作为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失败。他把产权关系扭曲看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又认为明晰产权不一定就能产生效率。他的看法有多少是对的,又有多少是错的,值得人们去思考、去检验,但首先,你就得知道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什么是华盛顿共识,什么是新古典范式。

那本批评计划经济的名著《短缺经济学》曾经风靡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作者科尔奈也因而为我们所熟知。他提出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并被吸纳进了一般经济理论。这是一个在欠发达国家产生出重要理论的典范。他的成功来自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计划经济实践,从而能够更容易地观察和捕捉到在计划经济下比在市场经济下表现得更突出、暴露得更清晰的软预算约束现象。二是多次访问英美大学所作的知识准备。我们现在丰富的实践,为我们的自主理论创新准备了第一个“行”的条件,而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我们还要作好第

二个“知”的条件准备。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态度既是实事求是，也是与时俱进。这不是不要理论，而是不盲从不轻信未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即使对那些在彼时彼地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也不采取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态度，而是要看它们在中国经济的此时此地是否也被证明是真理。这也不是经验主义，而是不断思索，不断总结，不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在生活中，真理与谬误常常纠缠在一起，而在学术界，却又总有那么一些人声称已经掌握了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和谐而不是争执，宽容而不是独断，创新而不是守成，谨慎而不是鲁莽，会有利于我们广泛听取、比较和鉴别各种观点和意见，充分吸收、消化和利用各方面的经验，从而在亿万群众参加的中国建设实践中，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来。

从这样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你就会欣喜地发现，我们还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在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如此大规模地在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和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对国情这样了解，与世界这样沟通，和前沿这样逼近，对未来这样乐观；我们更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积累了如此之多，如此之宝贵的具体结论：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稳定、改革和发展，按贡献分配，现代公司制度，科学发展观，效率、平等与和谐，竞争与创新，等等。只有了解历史，了解世界，了解全部经济学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这些结论是多么重要，这些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这些结论，已经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成了我们制定路线与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成了我们写就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篇新时代大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我们的主流，与时俱进，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边缘化。当我们在课堂上大讲特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更要大讲特讲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为，前者，是我们向世界学习；而后者，才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

方向已经辨明，道路正在脚下，有志气、有抱负、有能力的中国人，坚定往前走，不动摇！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费方域 教授

注：程金伟等同志帮助我初译了第六版新增的章节，并对其他部分作了校对和修正，特致感谢。

第二版译者的话

(一)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自从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于1935年问世以来,这个定义就一直在英美等国教科书中占据统治地位。时下经常见诸国内报刊文献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词,大多也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古希腊人最早创造了经济学这个名词,但只赋予它齐家之道即家庭管理法则的意思,而没有将它视为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研究领域。到了1615年,就有一位不重要的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德瓦特维尔,出于“生财之学,于家于国皆同”的辩争,首次将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却还是在古典经济学问鼎欧洲以后才被人们普遍接受。它集科学、道德、哲学和技能于一身,熔理论原则、实际政策、科学证据和政治辩护于一炉,始终关注国民财富和经济的增长。

整个19世纪,政治经济学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把现存的制度当作外在的、既定的或从来就有的社会秩序,强调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约成某种可以像物理学那样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试图以此来达到净化经济学科的目的。另一个方向是对既定的社会制度本身提出疑问和否定,强调将生产关系作为主要内生变量进行研究,试图以此来达到拨正经济学科的目的。

在西方,第一个方向被描述成经济学科从本来具有道德、政治和规范特点的政治经济学转换成为具有

工具、科学和实证特点的经济学的过程。其间，一方面，是经济学从传统意义的伦理哲学中分离出来，只研究可以纯粹用目的和手段来刻画和判断的人类理性行为。这也就是说，经济学中的人，不再是有丰富情感，有爱人之心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帕累托称呼的那种有动机、有能力寻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抽象的“经济人”。趣语“经济学节约了爱”，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是经济学的分析和论证尽量仿效精密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做法。市场交换关系被看作可用方程组表达的自发趋于和谐一致的系统，对于经济活动的理解，就从这种系统的假设中取得。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189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和里昂·瓦尔拉斯 1874 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对这个阶段的演进作了影响深远的总结。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政治经济学这个词从经济论著的标题中消失了。奠定在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综合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这就是罗宾斯定义的经济学的。

稍后，经济学进一步分化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最早把这两个概念抽象出来的，一说是挪威经济学家雷格勒·弗里希，1933 年，他在一篇向古斯塔夫·卡塞尔表示敬意的论文中，分别用“微观动态”和“宏观动态”这样两个词概括对个体行为和总体行为的分析。另一说是丁伯根在荷兰统计学院的同事德沃尔夫，他在 1941 年的一篇题为《需求收入弹性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解释》的论文中，首次正式使用了这两个术语。可在我看来，实际上，真正使这种区分深入人心的，却是并未使用这些术语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正是他 1936 年问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才使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政策措施得以确立，才使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离得以完成。

凯恩斯以来的宏观经济学，我以为经历了两代。第一代的特征是，从假设的经济总量的函数关系如消费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函数等出发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第二代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不论是沿着瓦尔拉斯，还是非瓦尔拉斯的方向，都积极构筑自己的微观基础，使总体的行为和关系，能合乎逻辑地从个体的行为和关系中得到说明。从混沌变为离析，再在对立中达到统一，这就是经济学走过和正在走着的道路。

不论经济学是合还是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实际上始终没有发生过丝毫动摇。显然，这同 16 世纪以来，滋生和哺育经济学的生产方式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有关，也同经济学歌颂和维护的现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基本信条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有关。微观经济学的主要使命，就是精辟阐述、严密论证这些信条的合理性和有用性。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研究领域是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理论；研究方法，除了无法回避的规范分析以外，主要是实证分析，大量采用数学技术。

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我看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古典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主要借助文字和图表，对供给（穆勒）、需求（杰文斯）、分配（克拉克）、

单个市场(马歇尔)和多个市场(瓦尔拉斯)的交换与价格决定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第二个阶段,到希克斯和萨缪尔森,主要运用微积分,对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等进行重塑和补充。第三个阶段,到阿罗和德布鲁,主要运用集合论和线性模型,在效用函数理论、竞争均衡和最优性问题、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均衡、投入产出分析和博弈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第三个阶段,到当前,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发展了交易费用、产权、非均衡、X效率、寻租、信息、次优、机会选择、资产定价、资产组合、跨时期分析、整体分析和对偶分析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拓宽了传统的学科边界和应用领域。

但是,从亚当·斯密至今,上下几百年,贯穿全部微观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的主题,我看却始终只是一个,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信条: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大量自由的、极端自利的、追逐最大利润和最大效用的个人的分散活动,经由价格和竞争机制调节,会自动趋于和谐、有序、均衡,达到最佳效率状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于该信条的证明的日趋严密和简洁,就是微观经济学的日趋成熟和精确。

这样,用公理化方法,一般地、严格地、简洁地证明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性和最佳性的阿罗-德布鲁定理,就格外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仅严格证明了最佳的有秩序的经济配置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而且还对达到这种结果所需要的条件作了详细规定。假设的明显化,使理论的适用范围变得容易判别,使要出现这样结果的理想世界应该怎样变得容易理解,还使不存在这些条件的现实世界变得容易认识。

完全竞争的假设(透明性,同一性,原子性等等)几乎没有一条是真实的,实际的市场既不完全也不完善。在存在规模经济、外部效应、内部效应和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混合经济能够达到怎样的状态,这是现在经济学家要回答的问题。虽然,就政府干预而言,目前不是要不要,而是实施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却还只是市场的补充和修正。

以上所述是西方经济学的演进脉络,也是本书的学科背景。

(二)

越是成功的经济学家,越是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旧知识的积累,就不会有新知识的拓展;经济学的进步,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因此,他们在重视学术论文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概览和教材。在西方,许多站在科学前沿,研究成果卓著的知名经济学家,都肯拿出时间亲自动手或主持撰写经济学教科书,原因也就在这里。

由经济学家写的教科书,同非经济学家写的相比,在视野、领悟、贯通、确切、适用等许多方面,显然有很大的不同。本书作者哈尔·R.范里安是位经济学家,在密歇根大学执教多年。下面,我们就以他的这本书作为“典型”来分析一下,就反映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本来面貌而言,经济学家笔下的教科书,怎样地有别于非经济学家编写的教科书,换言之,也就是借它说明,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具备怎样的特

点,在经济学的传播、继承、应用和创新过程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本书所具备的主要特点和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呢?

富有内容,使微观经济学的全部历史发展,在这里得到完整的逻辑展开;设立阶梯,使依赖它完成知识准备的读者,能一下子“站在前人肩膀上”,是本书第一个方面的特点和作用。

首先是阐述的全面性。本书做到了:(1)研究推进到哪里,对于文献的概括和总结就跟随到哪里。比如,作为1990年和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成果的资产组合论、资产定价论和科斯定理的主要结论,1987年就被编进了本书第一版。(2)在传统论题中注入新思想、新观念。比如,用序数效用取代基数效用,用偏好说明效用,来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基础,不仅避开对个人基数效用无法测度和比较的诘难,而且还能通过显示的偏好,使偏好能由可观察的个人选择推出。(3)更准确地重新表述原有的命题。比如,正是由于在被不确切地写作商品需求随着价格的上升而下降的需求法则上,严格地加上了如果这种商品的需求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这样一个限制,才使消费者理论不致成为与所有行为都相容的没有特定内容从而也没有价值的经济理论。

其次,是阐述的系统性。本书做到了:(1)首尾一贯,相互照应。作为全书主题的竞争均衡存在性和帕累托有效率原理,被安放在消费者效用极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极大化,以及市场供求相等这样两块基石上。就技术而言,均衡价格的存在被置于供求函数的连续性之上,而连续性的存在又被置于凸性偏好、凸性技术的假设之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出现以前,除了垄断和不完全竞争,交代的都是它们成立的逻辑前提,而在它们出现之后,加上垄断和不完全竞争,阐述的都是假设条件不存在时的结果和补救办法。(2)由简到繁,层层深入。比如,通过将消费者收入由既定改变为获得,将消费的时间选择由单期延伸为多期,范围由普通商品扩大到资产商品,条件由确定性修正为不确定性,环境由商品市场发展发展到保险和股票市场,对简单消费者模型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拓展,紧凑而清晰。(3)组织严密,排列有序。比如,诸多的寡头垄断模型,一经按照产量领头、价格领头、联合定产、联合定价和串谋分类,它们的联系和特性就变得很容易把握了。

突出方法,竭力推行适宜中级水平的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技巧;提供工具,使学生一下子就能够掌握成套善事的利器,是本书第二个方面的特点和作用。

微观经济学研究理性的个人在一定的资源限制下所能作出的最优选择。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个人行为模型,形式上都可以归结为用最优化方法来处理的问题:通过确定进行选择的主体、可行范围和目标,在选择变量受约束的条件下,求目标函数的极大值。从而使得数学规划成为讨论它们如何求解和解如何随参量变动的一般条件的极为便利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任何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所有其他个人最优选择的函数,所以对于市场供求相等的经济均衡的研究,在形式上就可以归结为对于联立方程组的解的存在性、惟一性和比较静态性质的研究,因而可充分地

利用有关的数学工具。极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是在构筑和分析微观经济学模型时最经常使用的技巧,也是本书竭力推行的基本分析方法。

为此,作者颇费了一番苦心。一方面,运用微积分,显然,这样不仅可以使许多论证变得相当简洁、严密,而且,由于它的灵巧和精确,常常还可以使所研究的问题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但另一方面,考虑到那些缺乏数学准备的学生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又不得不将它们作为附录,而将正文的数学分析限制在初等代数的水平上。可贵的是,即使这样,也还要让学生能体会经济分析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养成用等式或数字表示经济问题的习惯,能学会给经济问题以定量回答的本领。因此,我们在书中见到的是详细说明的基本概念、明确交代的假设条件和由假设到结论的周密严格的数理推导。不管分析是用数学符号、图表说明,还是用文字阐释处理,构成分析基础的实质上都是已被作为标准形式采用的公理化方法。深入浅出,用简易的运算和分析推出通常由高深奥秘的现代数学证明的结论,又不失论证的严密性和一般性,不能不说是本书初版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注重应用,理论和方法都密切联系现实问题;启发诱导,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和技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本书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和作用。

1. 不论怎样抽象的理论,都处理得可以用来分析实际问题。消费者行为理论,历来被视为微观经济学中最神秘、最抽象的部分,为了使它能用于政策评估,本书除了像多数教科书那样由偏好效用函数导出需求函数以外,还特别地关注由观察到的需求行为估计偏好和效用函数的问题。这样做的基本思想是:一旦根据对选择行为的观察资料,估计出了偏好和效用函数,就可以用它来预测新情况下的选择行为和评估政策建议与环境变化。据此,第5、7、14章,分析介绍了用商品平均支出份额估计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用显示偏好分析估计无差异曲线,用消费者剩余测度拟线性效用,用货币测度效用等几种方法,并列举了应用它们进行税收、公共运输系统、社会保险金计划等公共政策评估的实例来加以说明。

2. 逐步放松假定,让理论不断逼近现实。微观经济学的相当部分,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这些假设,包括供求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都有完全的信息,消费者效用函数只是他自己的消费和要素供给的函数,厂商的生产可能性只取决于他自己的投入和产出,以及不存在规模收益等等,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违背现实的。因此,理论要能被应用于实际,这些假设就必须随着分析的深入和概括的趋于全面,而被逐渐地放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各门应用经济学,如财政学、产业组织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生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等,就是这些假设放松后才找回的世界。微观经济学作为各门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的地位,也就是这样奠定和巩固的。

3. 大量列举具体例子,生动说明理论和方法如何付诸实践。各种例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虚拟的,另一类来自报告文献。目的是借以启示学生,应该怎样把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转换为能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方法处理的形式,再通过图形分析和代数求解,找出量化的并被赋予了经济含义的答案。这样做不仅可使学生的

直觉、抽象能力、建模技巧、解题水平得以提高，而且理论的经验意义也显得更为明朗：可以并且应该加以应用和得到检验。本书作者在一版序中曾说，他见到的许多教科书，常常不能使学生解决像具有线性供求曲线的竞争市场会对税收作何反应，新厂商进入会对古诺均衡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类问题，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提供分析工具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视作本书的写作意图和创新尝试。他如愿了。

以上，是本书称得上微观经济学“典范”教材的根据，也是我们在众多的同类教材中选择翻译它的原因。

(三)

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欧和美国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主要是美国经济，明显地刻着那里的制度烙印。当它们被介绍到具有不同文化、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中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它们能有多大程度的适用性？虽然，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必须诉诸经验事实的回答，可是，人们却总愿意先从理论上对它作一番探讨。

一部分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只存在一种经济学即罗宾斯所定义的那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脱离了经验主义的观察和对政策的关心，完全独立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一部分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则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学，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多少类似于，或正在变得越来越类似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事情真像第一种认识那样，倒也简单。既然只有一种经济学，那么别的国家只要将它原封不动地搬去，就可以描述和规范那里的经济活动了，又何必还要称它西方经济学呢？

如果事情真像第二种认识那样，倒也干脆。既然意识形态水火不容，那就各自关门搞自己的经济学好了，又何必还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呢？

显然，实际情况既不这样简单，也不这样干脆。这里的关键在于，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学的性质和应该怎样对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利用有限物质资源满足各种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它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人们的这种经济活动。因此，不论是对人与人关系的洞悉，还是对人与物关系的观察，它的内容都应该在现实中存在原型，它的每一个概念、每一则命题、每一条原理，都应该得到逻辑的证明和实践的检验。由于认识和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同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所揭示的，也都是有条件的真理：一方面，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在特定的时空中起作用；另一方面，只要条件具备，就不受时空限制，总会起作用。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独立于人之外,先于人类就已存在的自然界的运动规律,而是人参与其中,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展示的经济运动规律。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历史活动,所以,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那一个历史时代的规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每一个国家都有那一个国家的历史,它们过去走过的路不相同,现在走着的路也不会一样。自然界尽管也有历史,但它不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就认识论来讲,自然科学不像社会科学这样受到对象本身历史发展的限制,因此,经济学是历史科学,而物理学不是。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实践,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和组织结构中进行,体现着人们一定的目的、要求、利益。因此,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固然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有着各种经济理论都必须解决的若干基本经济问题,有着对各种经济理论普遍适用的一般分析方法,有着各种经济理论共同采取的某些政策工具,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经济情况不同,所以,共同的对象采取了因时因地不同的形态。共同的问题出现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和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共同的方法被用于分析不同的运转机制,因而共同的政策在不同类型经济中的作用范围、方式和结果大相径庭。所以,经济学,在它实际存在的形态上,总是一个个深刻烙有时代和发源地印记的经济理论体系。它们每一个都是具体的,整个体系由一条被认为是反映了所考察经济阶段主要矛盾发展的主要规律贯穿、统帅,并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既然各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同,所走的具体道路不同,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有多少种经济,就有多少种经济学(或者说经济理论体系)。其实,甚至关于同一种经济,也有许多种经济学。当代美国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对峙,就是一证。

有这么多种经济学,怎样把握?既然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种,为什么又要对它特别地加以关注呢?

众多的当代经济学,可以分类把握。例如,按社会制度划分,可以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按经济发展的水平划分,可以有发达国家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按经济运行机制划分,可以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学。

对于每一种类型的经济学,可以通过典型加以把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中心是英国,所以,英国的经济学成为那时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今天,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心移到了美国,所以,抓住了美国经济学这个典型,就可以以一知万,知道其他许多种同类的经济学是怎么回事了。

以美国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几百年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相互作用的产物。经济发达的程度,为它反映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变量依赖关系提供了客观的条件;由长期的理论争鸣和意见交锋沉积下来的专门知识,为它形成一个关于经济过程的前后一贯的体系创造了主观的条件。实用性,即不同程度地